

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

——对于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评述

郗捍烈, 冯兵, 刘旻航

(山东财政学院体育教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通过对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历史分析, 针对体育课程改革中的决策、问题、策略、集体与个体、权力、环境、动力和形式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展开分析, 指出我国体育课程改革一直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之中, 并且认为我国体育课程改革将会一直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制衡下发展。

关键词:理性; 非理性; 博弈; 体育课程; 改革

中图分类号: G807.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12(2009)04-0095-04

Gaming of Ration and Non-ration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QIE Han-lie, FENG Bing, LIU Min-ha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250014,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historical analysis 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pointing to the related issues such as decision-making, question, strategy,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authority, environment, power and form and so on, the paper launches the analysis. It puts forward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has been in a gaming of ration and non-ration. It also thinks that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will develop under the check and balance of ration and non-ration.

Key words: ration; non-ration; gaming;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体育课程改革在我国体育课程发展的各个时期, 几乎就从没有间断过, 并且也不会停止, 可以说, 体育课程改革将会伴随着我国体育课程的发展一直延续。因此, 及时对于我国体育课程的改革进行必要的总结, 对于未来我国体育课程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回顾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其始终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之中。一方面, 我们课程的制订者总是试图用一种或几种范式来约束、规范我们的课程, 从而实现理想中的管理便利; 另一方面, 课程自身和课程的实施者又总是并不完全按照课程的制定者的最初意图来将理论转变为现实, 使课程又处于一种非理性的发展态势。这种矛盾几乎贯穿于整个体育课程发展史。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场景出现, 又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体育课程的发展, 将是我们重点研究的问题, 我们将从以下八个方面来逐一探讨这个问题。

1 体育课程改革中的决策

任何改革都离不开决策, 关于体育课程改革的决策, 应当是体育课程改革的肇始。政策制定者有义务制定政策、设立标准并监督其实施, 然而, 仅仅有这些对于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似乎远远不够。他们对于所预设的教育目标, 总是要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思维, 来告诉(或者说强制决定)课程的实施者, 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比较重要的等等。这种看似缜密的思维方式, 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换回的往往

是一种更加顽强的非理性对抗;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总是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问题, 或者课程改革的实际进程总是偏离预定的轨迹(几乎无一例外); 教师作为课程改革的重要实施者总是热衷于逃避课程改革, 对于新课程改革似乎总是缺乏足够的兴趣; 学生作为课程改革的另一重要实施者, 又感觉自己是从一个范式进入到另一个范式之中, 总是所有的范式并不是他们想要的“范式”……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现象的发生呢? 作为课程改革的制订者而言, 面对宏大而又复杂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 似乎总是想做到万无一失, 将每一个细节都尽在掌控之中似乎才能够称其为一种完美的体育课程改革。然而, 我们课程的制订者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 体育课程自身并不是流水线, 我们无法让其严格按照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按部就班的完成所有的步骤, 作为课程自身它具有很强的不可操控性, 它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并且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和可变性, 这也就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同时, 作为课程的实施者——教师和学生而言, 他们并不满足于并且也算不上做一名称职的“操作工”, 而是更热衷于“工程师”这种更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具有浓郁的艺术气息, 需要更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同时, 对于体育课程而言, 由于活动性、技艺性课程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的“灵活性”。因此, 这也从本质上导致了他们对于课程制定者的“非理性”的冲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对于越复杂系统的变革, 人为的所能强迫

系统做的事情就越少(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试图将自己变成能够包办一切的超人),这才是导致体育课程改革的决策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博弈的根本原因。

2 体育课程改革中的问题根源

对于改革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总是让课程改革的参与者头痛的一个问题。问题,总是伴随着每一次的课程改革,尽管我们是如此的想避开它,但是它就像一个魔咒一样,始终如影如随。于是,问题接踵而至,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敌人一种是朋友,当敌人和朋友纠缠在一起时,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博弈再一次发生了。

非理性者的(对待问题的)焦虑来源于对课程改革中出现问题的痛恨,在他们看来,所有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是体育课程改革最大的敌人,它使得体育课程改革始终处于动荡之中,使得体育课程改革无法按照既定目标实现,使得体育课程改革总是成为饱受非议的攻击对象……总之,正是由于问题的出现,才使得体育课程改革变得极其复杂,问题成为阻挠体育课程改革的最大敌人。然而,理性的思索者们却坚持认为,体育课程改革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应当成为体育课程改革的“朋友”。因为面对问题,我们必须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深入到问题之中,才能够提出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在他们看来是通向更加深入变革和达到更为满意途径的“捷径”。因此,问题应当作为朋友一样要“抓住”,而不是“逃避”!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最理性的思索者,面对“问题”这个朋友时,也并不总是愉快的(这种情感上对于“非理性”的不自觉倾向性,才成为两者之间争斗的平衡点),也总是试图发表一些华而不实的见解或者索性将矛盾直接掩盖起来。在这个时刻,他们又面临着理性与非理性的抉择。因此,一种新的模式正在悄然出现,这或许会为他们之间的争执寻找一种解决的方案:“实质性的变革包含着复杂的过程,复杂的过程本身就充满着问题。坦率和探索的精神对解决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变革就是学习!”帕斯克曾经指出:“生活并不遵循直线的逻辑;它遵循一种改变事物的性质且往往将其推向对立面的曲线的逻辑。然而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讨论要解决上,然后就放在一边。我们需要重视寻找解决办法的过程,有意义的解决办法需要对矛盾进行反复的探讨。”只有当我们对问题采取行动的时候,问题才能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或许才是理性与非理性最终博弈的结果。

3 体育课程改革中的策略

在体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之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当一种指导思想、理论被拿来应用到课程改革之初的时候,都会受到强烈的追捧,被奉为“金科玉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曾经引导课程改革的“风向标”又都无一例外的饱受非议,被打入冷宫。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频繁发生?这恰恰是改革的策略在进行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的结果。

我们仔细分析,凡是在课程改革之中得以应用的理论,都是代表了当时课程领域发展潮流的理论,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在理解与实施的过程中也很少被误读,应当说还是很好的被解读和贯彻于课程改革之中,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呢?或许更多的是在决策的过程中

发生了问题。在决策伊始,课程的制订者几乎凭借着一种非理性的冲动试图将世界上所有最美好的理论、方法全部应用到我们的课程改革之中,并且也得到了课程实施者的非理性支持——毕竟这些理论代表了先进性、科学性。然而,经过若干实践之后,课程的实践者首先开始理性的对待这些理论、方法,它们究竟能否适应我国的体育课程改革。当理论的光环逐渐褪去之后,人们又开始进一步的找寻它们的弊病。进而通过信息反馈的渠道,课程的制订者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于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非理性批判——一如它们开始登陆我们的课程改革之时所受到的关注!这种在我们看来近似于某种疯狂的行为却总是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课程改革之中。改革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当我们的课程改革在决策的初期,却首先想到的是要超前发展、紧跟时代潮流,很少能够意识到我们需要的是“对症下药”。或许在未来的体育课程改革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除去一些非理性的狂热,才能使我们的体育课程改革走上一条适应自身发展需求的道路,但事实总是事与愿违,无数次的经验教训还是无法换回人们思维意识中那一刻的非理性冲动,所以才导致了体育课程改革中所谓“钟摆现象”的频频出现。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正是由于这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纠缠,才不断的催生新的课程理论、方法的问世,不断地激励着体育课程的发展——这或许也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

4 体育课程改革中的集体与个体

体育课程的改革是一种全方面的集体行为,这是所有课程参与者所能够达成共识的。然而,任何体育课程改革又都要依靠参与改革的个体来实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又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因此,这就导致了集体与个体之间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集体主义利益更多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结果,它代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一个综合博弈的结果,这其中有利的一方自然也就有牺牲的一方。然而个体则是仅仅着眼于自身利益,就个体而言,不能存在得利与牺牲的整体效果,它更加看重的是自身利益的损耗,也就是说它更注重的是自己切身利益(的获得)。

这种存在于本质上的差别,成为体育课程改革的困难所在。就体育课程改革而言,尽管不会屈服于某些个体的利益,不会受他们左右,但是却又不得不认真的考虑他们的利益。而同样作为个体而言,既不会置集体利益于不顾,也不会自觉自愿的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如何找寻体育课程改革中的平衡点,将是两者重点博弈之所在。当新的体育课程改革政策出台以后,需要依靠个体来完成其实施过程时,往往是体育课程改革遇到阻力最大的时候。在政策制定时期,由于并没有发生利益等当面的冲突,因此,在这个阶段体育课程改革往往是在一片叫好声中开始。但是由于一旦进入实施阶段,矛盾开始显现,冲突愈发激烈的时候,关于课程改革的众多非议开始增多,这是人性之使然。然而在这个阶段确实对于课程改革而言至关重要,大多数的课程改革进行到这个阶段,多会被片面的认为不成功,在此时,课程政策的制定者显得尤为被动,在这个阶段,双方会进行一次至关重要的妥协。个人主义被课程制定者再次给予充分的考虑,而集体主义也同样成为

个体所必需慎重思索的问题,双方在理性状态下的博弈,换取了一个双方都认为是“非理性”的结果——即双方都不是非常满意却又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课程改革方案。由此,课程改革得以再次的顺利实施,却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最初预定的方向,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体育课程改革的结果都会产生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根本原因之一。

5 体育课程改革中的权力

任何改革都会牵扯到权力的分配,体育课程改革也不例外。权力的分配无外乎两种形式:集权和分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热衷于集权,或者说更加倾向于集权背后的控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体育课程一直延续着集权的改革模式,严格的控制着体育课程的发展。然而伴随着全社会自我意识的崛起,体育课程改革中的权力意识得到了挑战。究竟谁应该掌握体育课程改革的话语权?是课程改革的制定者还是课程改革的实施者,或者换句话说,体育课程改革的模式究竟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这种挑战的终极最终再一次引发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

“管得过严、统得过死”一直是我国体育课程中最饱受非议的地方,全国大一统的课程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体育课程的僵化,从而阻碍了体育课程的发展。但是,过度的权力下放,又使得体育课程缺乏必要的约束性,甚至于最直接的后果导致了学生体质的连年下降,这同样也违背了体育课程最根本的宗旨。“集权失之过分控制,分权错在走向无序”,如何把握权力分配过程中的“度”,成为两者博弈的焦点。在最近一次体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之中,“三级管理体制”始终贯彻于整个新课程改革之中,这应当说是两者交锋,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在现阶段,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课程所有参与者的权益,在短时期内为体育课程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但是,课程参与者对于权力的诉求只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的增长(这是人的天性使然),因此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很快就会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另一种权力分配关系,从而引发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这种对于权力的博弈,导致了体育课程从一种控制向另一种控制的非理性摆动(很多时候权力的分配并不完全是理性思考的产物),给体育课程增加了一系列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博弈的双方都已经意识到,在体育课程改革过程之中需要的是双方的合作,以求达成一种相互支持、协作甚至于给予压力的双向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作用于体育课程改革,而不是简单的由一方取代另一方或者一方完全服从于另一方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关于权力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终究逃脱不掉合作的范式,博弈的结果其实只是对于合作形式的不同理解。

6 体育课程改革中的环境

体育课程改革是需要一定的改革环境的,它需要找到合适的生存土壤来发展自己,这是体育课程改革经过多年的摸索之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体育课程本身属性的多样性,既属于教育也属于体育领域,这从一个方面既扩展了体育课程的发展空间也使得体育课程生存的土壤变得丰富起来。但就另一个方面而言,正是由于这种属性的多重性,也使得体育课程的生存“领地”变得更加模糊起来,在任何一个领域之中,似乎都成为“边缘”性的学科,甚至发展反而相对滞后。因

此,体育课程必须为自己找寻一个适应自身发展的环境已经成为体育课程改革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除去自身环境因素之外,体育课程改革还面临着很多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外界环境的影响又更容易在短时期内对体育课程改革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上个世纪初期的“军国民体育”、上个世纪末的“素质教育”以及最近一段时间提出的“阳光体育”等等,这些外界环境的变化,给体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同时,它们也为体育课程改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终身体育”意识的日益普及,民众对于“健康”理解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体育课程的期待也在不断提高,传统的体育课程其时间界限被消除,由学生生涯转变成为终身学习;传统体育课程其地域界限在被尽可能的放大,从传统的课堂向学校、学区、社区转移。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影响体育课程改革的环境也并不总是肥沃的土壤,在很多时候也会遇到贫瘠的“盐碱地”,例如体育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小三门”位置以及被排除在整个高中考试(尤指高考)课程体系之外的现实,都从另一个角度在制约着体育课程的发展,影响着体育课程的改革。

以上这些又都引发了体育课程之中的一系列博弈,既有课程自身属性的博弈,又有课程与环境之间的博弈,并不是所有的环境都是有利于体育课程改革的。即使我们看上去是更有利于体育课程改革的,也同样存在着能否与体育课程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体育课程自身一一解决,这或许就是体育课程改革环境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7 体育课程改革中的动力

改革是需要动力的,但是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方?这是改革之中理性与非理性博弈的又一战场。这个战场被人为的分为两个断层,一方面来自于课程政策的制订者——课程管理者和专家;另一方面源于课程的最终实施者——教师和学生。两个战场都在进行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厮杀,从而使体育课程改革看上去都陷入到一定程度的混乱之中。

作为课程政策的制订者们,在课程的实施者们看来,总是想当然的在不切实际的制订一些让他们很难做到的课程调整,而这些调整往往伴随的是“费力不讨好”的结局。而作为政策制订者又总是感觉课程的实施者对于新的体育课程改革总是抱有抵触的情绪,并不是真心的希望改革的发生,因此也就导致了自已所制订的关于课程改革的相关政策、措施得不到应有的贯彻与执行,从而部分的导致课程改革的失败。这似乎已经成为各种体育课程改革最终的结局。其实在这场理性与非理性的战争中,理性的课程制订者是能够充分考虑到课程实施者所面对的困难,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制订的课程政策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乌托邦式的浪漫在其中,但是又往往总是固执的、非理性的认为课程的制订是近乎完美的,所有的问题都源自于课程的实施者,从而最终导致了自身对于体育课程改革的动力不足——这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在非理性的状态下得出结论的后果。认为自身已经在改革的过程中竭尽全力,错误总是出现在另一方,从而失去了对自己进一步检讨、追问、反思的动力。而作为另一方,课程的实施者,对于每一次体育课程改革,几乎毫无例外的第一反应就是带有强烈非理性色彩的抵触,“又要改革!”这种源自于按部就班(已经习惯于自己授课、上课的方式,不愿意再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接受新鲜的事物)的非理性的“理性思索”,直接导致了课程实

施者对于体育课程改革的动力不足。他们甚至认为课程改革永远是课程政策制订者的事情,自己好像是一个置身度外的旁观者——其实他们的理性却始终在提醒他们事实远非如此!这就形成了一幅有趣的场景,两个同舟共济的人,都认为自己已经竭尽全力,总是抱怨对方划桨的速度太慢,但是他们自己非常清楚,自己也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投入到其中,只是近乎于本能的首先指责别人。这就是体育课程改革为什么让人感觉总是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体育课程改革并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事情,而是这个体系中所有成员的共同追求,只有大家都百分之百的付出,才会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希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都要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

8 体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与结果

迈克·富兰曾经说过,教育中的改革是一项旅程,而不是一种蓝图,变革终究是非直线的,充满着不确定性,这是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个论断。而事实上,在我们实际的体育课程改革之中,我们却又总是事先将改革规划在一个看似宏伟的计划之中,希望我们的课程能够按部就班的按照预期的描绘发展,这也同时引发了我们关于课程改革的又一场纷争。课程改革的实际操作与我们的事前规划不相符时,我们该如何去做?我们的理性始终在提醒我们,这种情况的发生非常正常,无须大惊小怪,这才是课程改革的真实场景。而我们的非理性思维却执拗的认为,这意味着课程改革的失败!因为我们得到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想要的(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课程改革都面临着同样的结局)。这就引发了我们对于课程改革再次思索:事先规划好的课程改革还能够称其为“改革”吗?如果一切都已经勾画好,成为一张图纸,一切都完美的按照计划进行,那么课程改革将不再是“旅程”,也会因此失去旅程中所有的色彩,而变成一场索然无味的“施工”(尽管这并不可能)。况且,作为千百万人同时参与其中的浩瀚工程,如果真的整齐划一,那么所有的人无非只是生产流水线中的

一颗螺丝钉。失去了人性闪动的教育,教育的价值又何在?其次,面对课程改革我们注重的是过程还是结果?体育课程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推动体育课程的发展,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体育课程改革的结果终究还是体育课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过程近乎于完美,那么结果或许对我们也就真的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况且完美的过程必定会造就完美的结果),这就像是旅游的过程中,我们究竟在乎的是沿途看风景的心情还是“到此一游”的结果?对于体育课程改革而言,一个好的结果是我们所期待的,但绝不是最终的唯一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

体育课程在我国经历了 100 多年的历程,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博弈始终伴随着体育课程的发展,甚至已经变成体育课程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因为两者之间激烈的对抗,才使得体育课程能够不断地发展、完善自我,也使得体育课程始终处于一种牵制、反牵制的动态平衡之中。我们相信,伴随着体育课程的发展,这种博弈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将会愈演愈烈,成为体育课程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参考文献:

(上接第 87 页)那么社区与学校共享需要学校先行,当前共享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不使人们认识到共享中出现的问题远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综合、全面、系统分析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揭示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是什么,是什么而造成。公共产品理论、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成本交易理论、产权理论无疑是洞悉这些问题的最佳理论与最佳视角。整合这些理论形成具有特色的城市社区、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是解决今后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出现的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城市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目前刚刚开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紧紧围绕着资源共享理论探索共享中宏观与微观管理模式与方法将会促进共享的发展,沿着体育设施资源共享对资源进行配置、共享管理,特别是在和谐社会下协调发展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推动城市体育的和谐发展将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雷晓康. 公共物品提供模式的理论分析[D]. 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116.

- [1] [加]迈克·富兰著,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译. 变革的力量[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39, 50.
- [2] 杨启亮. 著. 困惑与抉择[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
- [3] 胡定荣. 著. 课程改革的文化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 [4] 顾渊彦. 著. 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
- [5] 周浩波. 著. 教育哲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 [6] 刘旻航, 孙庆祝, 付玉坤. 对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反思[J]. 体育科学, 2006(10), 75-81.
- [7] 刘旻航, 孙庆祝, 付玉坤.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价值本质[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6(2), 84-87.

- [2] 陈聪.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研究[D]. 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47.
- [3] 熊红芳. 公共资源制度变迁研究[D]. 中南政法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163.
- [4] 许永刚.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D]. 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275.
- [5]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 [6] 贾英健. 社会哲学视野中的制度创新[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2, 47(2), 37-40.
- [7] 袁义才. 公共产品的产权经济学分析[J]. 江汉论坛, 2003(6), 25-28.
- [8] 袁旦. 中国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研究[D].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 2005, 133-155.
- [9] 解晓东. 试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必要性与可能模式[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3(6), 21-24.
- [10] 陈伟东, 李雪萍. 社区产品属性与供给机制[J]. 中国民政, 2003(3), 21-23.
- [11] 任海, 王凯珍, 肖淑红, 等. 论体育资源配置模式[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1, 12(2), 1-5.